

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

黄见德 著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华中理工大学文学院学术丛书

B505
5

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

黄见德 著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第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黄见德 著

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6.3

ISBN 7-5609-1242-7

I. 西…

II. 黄…

III. 哲学-西方国家-研究-中国

IV. B1

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

黄见德 著

责任编辑 秦鲁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照排室排版

武汉大学出版社印刷总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5 插页:2 字数:358 000

1996年3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500

ISBN 7-5609-1242-7/B·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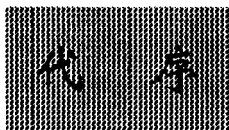
定价:16.5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调换)

DF77/21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西方哲学东渐史》(1840—1949)续篇的一部分,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和介绍当代中国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及其发展过程的著作。它从中西哲学交流和推动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出发,通过对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一历史过程中,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途径、内容和过程的考察,评述了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成果,总结了西方哲学传播的经验和教训,阐明了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揭示了这个传播过程的规律性。全书材料翔实,论述视野开阔,内容富于启发性,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谨以此书献给毕生为西方哲学东渐作出卓越贡献的贺麟教授、陈修斋教授！



提高,提高,再提高

——祝贺文学院成立

“文革”之后,在同类学校中,我们办文科最早。不仅是文学院现有的几个系,还有张培刚教授主持的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经济系、数量经济系、外语系。建筑学系历来列为工科,其实很牵强,世界上第一个建筑学系创办于巴黎美术院,是艺术与技术相结合,而且艺术的比重较大,至少可算为半个文科系。

几年来,尽管有一些不如人意之处,影响文科的进展,但教师是努力的,情绪是稳定的,基本上保存了元气。现在正式成立文学院,他们是毫无愧色的。

如何才能把文科办得更好?可以概括为两个字:提高。提高学术水平,提高教育质量。

为了提高,必须大搞科学研究。1978年召开全国科学大会,我提交大会的发言稿题目是:“科学研究要走在教学的前面”。有人赞成这个观点,但也有人反对这个提法,认为这是“重科研、轻教学”。其实,这是很大的误解。科研和教学是“源”和“流”的关系。我们是大学,不是中学,既要培养高水平人才,又要研究高深学问。只有把研究工作做好了,才能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两者的关系相辅相成,密切而不可分开。

19世纪初,德国教育家洪堡创办柏林大学,第一次将科学研究引进高等学校,实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对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是

一大贡献。1876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是按照柏林大学的模式创办的。世界上许多知名大学都随之纷纷仿效。现在我国不少大学,包括我们学校在内,都把教学与科研放在并重的地位。

就文科来说,由于我国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要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决不能一手硬、一手软,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非常之多。如不研究,我们的教师如何提高!?教育质量又如何提高!?

我们学校的文科还有两个特殊的优势,一是经济学家张培刚教授以毕生精力从事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造诣很高,已为经济学界所公认。二是中国语言研究,在不被当代人们重视的情况下,由于我们中文系的前身中国语言研究所,是在已故语言学教授严学窘先生主持下创办的,因而具有较强的实力;《语言研究》杂志也公认为学术水平很高的刊物,享誉国内外。

为了提高,文科学报要办得更好,力争公开发行(1994年7月30日,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发文批准《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编者注);希望出版社鼎力支持,力求使“文学院学术丛书”和文科方面的其他专著源源出版;尽人皆知,还要有丰富的图书资料。

不仅是文科,全校各学科都应发愤图强,进一步大搞科学研究,力求大踏步提高。

这里很有必要联系到研究生的培养。现在,我国博士点和硕士点越来越多,博士生导师和研究生也越来越多。我与在国外知名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和暂未回来的校友交谈中获得的印象是,必须具有高水平的科研课题,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任务是极为艰巨的。因此,我们应该经常苦思冥想的是,如何提高、提高、再提高,越高越好!

朱九思

总序

第一流的文科要有 第一流的学术水平

文学院于 1994 年春成立之后,即决定每年挤出一定的经费资助教师出版学术专著。同时,相应地成立了一个学术丛书编委会,作为丛书出版的决策机构。“风物长宜放眼量”,这是文学院的一个重大举措。

在经费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挤出一定经费资助出版学术专著,其意义是很大的。众所周知,高水准的文科是当代第一流综合大学的必备条件。世界上许多著名的综合大学,都有第一流的文科,第一流的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新闻学家、美学家……综合大学具有怎样的水平,不仅要看教学水平,还要看学术水平。学术专著就是反映学术水平的一个窗口。事实上,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的老校长朱九思同志早在 80 年代初期就提出,大学应办成“科研中心和教学中心”。请注意,“科研中心”摆在前面。实践证明,这个观点是正确的。文学院之所以竭尽全力,紧缩其他开支,挤出经费资助学术专著出版,其目的就在于要把华中理工大学的文科办出水平,培养出优秀的跨世纪人才。

文学院学术丛书编委会已批准殷正坤教授等著的《科学哲学引论》、汪平教授著的《苏州方言语音研究》、黄献文讲师著的《沈从文创作新论》等数本学术专著付梓出版。这些专著都具有相当高的

思想水平和学术水平,反映了这些作者在科学道路上不畏崎岖、勇于攀登,取得的新成果。

我赞赏文学院出学术丛书这一举措。

我预祝具有第一流水平的文科学术专著将源源问世!第一流的人才也将争芳斗艳地崭露头角!

杨叔子

自序

这里,只想说几句有关我写作本书过程中心情的话。

《西方哲学东渐史》(1840—1949)出版后,收到哲学界同仁的一些来信。信中除有热情鼓励的话以外,还希望我把中西哲学交流史的其余部分写出来。首先提到的是它的下卷,即1949年以来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实际上,这本来就在我研究课题的计划之内。只是在着手这个阶段西方哲学东渐研究的时候,根据资料掌握的实际情况,我决定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分别写出《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和《中国台湾学者对西方哲学的研究》;第二步,对它们进行提炼和概括,使之升华和融合为一部完整的《西方哲学东渐史》(1949—)。经过努力,前者现在同读者见面了。

写作这本书时,我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是:从中西哲学交流和推动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出发,通过对1949年以来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途径、内容和过程的考察,评述中国学者研究西方哲学的成果,总结西方哲学传播的经验和教训,阐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揭示这个传播过程的规律性。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这都是很有意义的。然而,当我进入酝酿阶段时,心情相当复杂,顾虑颇多。有怕难以胜任的担心,但主要是因为研究对象涉及的一些理论问题,怕难以把握;加之这些阶段西方哲学的传播者,绝大部分都还健在,其中有我的老师,甚至是老师的老师,自然更多的是我同专业的同辈朋友,写不好怕伤害了他们。

但是,全面接触资料以后,特别在广泛走访有关学者的过程中,我却被几代中国学者那种为了振兴国家科学文化事业、早日实现现代化,而不计较个人荣辱,孜孜不倦地吸取人类优秀哲学成果的精神所深深地打动了。其中,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贺麟教授和陈

修斋教授。

两位前辈都是在我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与世长辞的。贺麟先生是我的西方哲学史启蒙老师陈修斋先生的老师。确切地说,是在贺先生的影响下,陈先生才舍弃了原先学习的外交专业而把毕生献给西方哲学研究事业的。贺先生的学问和人格,像所有研究西方哲学的人没有不知道他的名字一样,也早为我熟知和尊敬。不过,直接聆听他的教诲,却是在“四人帮”垮台以后,尤其是在我写作《西方哲学东渐史》的过程中。从资料的提供、思路的选定到全书框架的建构,都得到了他热情和具体的指导。本来,该书的“序言”也是请他撰写的。但因健康已不允许他这样做,才改由陈修斋先生执笔。1991年5月,我带着刚出版的书去东单干面胡同看望他。然而这次出来接待我的却是贺师母。她领我进房站在先生的床前。当时,他安详地躺在床上,只能用慈祥的目光望着我,说话已经十分困难了。在此之前,我的确有不少话想要对他讲,尤其是《西方哲学东渐史》(下)的写作,有些问题要听取他的意见。但看到这般情景,我把所有的话都往肚里咽下,强忍着眼泪,暗自祝愿他早日康复。虽然语言交流难以进行,但从他那充满期待的眼神里,我能意识到他要对我说的一切。就在这个时候,我顿时觉得有一种感情涌上心头,即感到以贺麟为代表的几代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为西方哲学东渐作出的卓越贡献,犹如一座座丰碑,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通过我的笔把它们树立起来。辞别时,贺师母还特别告诉我,她会吧《西方哲学东渐史》中有关贺先生的内容念给他听。这话也一直激励着我写好本书。然而当我动笔不久,贺麟教授却走完了90年的人生之路,离我们而去了。

至于陈修斋先生,我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史,从一开始他一直是我最为具体指导的老师之一。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知道他背有沉重的包袱,但他那种风雨袭人、不改初衷和锲而不舍、默默奉献的精神,却在我的心田深深地扎根和开花。后来,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单位,但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特别是科学的春天到来之后,

他作为全国和本地区外国哲学史学会的领导人,不仅以从未有过的精神风貌进行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西方哲学史学科的开拓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①,而且,为了推动西方哲学的科学研究,他先后筹备和主持了全国、地区或专题性的学术讨论会。我作为他的助手协助他进行这些工作。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向我提出了研究西方哲学东渐史的建议,并在我写作碰到困难的时候,给予了多方面的帮助。看一下他为该书写的长篇序言,即能明白。可是,当我动笔撰写本书时,他却因病住进了医院。在这期间,不论他转到哪家医院,我都去看望他。在交谈中,他除了对我正在写作的《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给予了诸多指导外,说得最多、也是令他最为牵挂的则是他的《莱布尼茨哲学研究》。他担心发生万一,以致留下一个无法补救的遗憾。直到1993年7月,我到珞珈山下一间设备简陋的医院看他时,由于疾病的长期折磨,他身体十分消瘦和虚弱,呼吸要靠氧气瓶的帮助,说话气喘吁吁,很是吃力。但是,脑子还十分清楚,念念不忘的仍然是他早已开始写作的课题。其情其景,催人泪下。没有几周,他也随贺麟先生向着永恒走去了。

我把本书献给贺、陈两位教授,除了因为这些特殊原因,寄托我对他们无限感激和哀悼之情,以此慰藉逝去的学术先辈外,还想借此表达我写作本书的心情,并对从事西方哲学的学者提出诚恳的希望。的确,在酝酿这个课题时,我有过犹豫。但当我广泛接触中国学者的时候,我不但被他们传播西方哲学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深深感动,而且他们对我开展这个课题的研究,通过各种形式给予的关心和支持,更使我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之所以这样,正如他们反复嘱咐我的,这是繁荣国家科学文化事业提出的迫切要求。由此想到,我作为当代中国从事西方哲学研究队伍中的一员,亲身经历了这段西方哲学东渐的曲折过程,通过反思对其进行总结,从而推动中西哲学在更高层次上的交流和融合,既是自己的愿望,也是

① 《哲学研究》编辑部. 沉重悼念陈修斋教授. 哲学研究. 1993(10):80

以贺麟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学者的重托,更是进一步发展国家科学事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因此,我消除了顾虑,并以一种不同于研究《西方哲学东渐史》(1840—1949)时的精神状态投入了这项工作。在写作过程中,我常被学者们追求真理和献身科学的精神所感染,心里不时掀起阵阵波澜,有时甚至情不自禁地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这里,既有对他们命运的同情,但主要是从中看到了发展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希望。所有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我对本书的写作。就是在这种真挚的历史责任感和事业使命感的支配下,经过几年的探讨和思考,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写作。今天,我们国家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事业,都已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所以当本书问世的时候,还想在此寄语我国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要特别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繁荣局面,努力把贺、陈等老一辈开创的事业推向前进。

除此以外,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还常常被一个问题的处理弄得甚为苦恼,心情至今仍然十分沉重。这里,想借此机会向有关学者作出交代,以此希望得到解脱。就是本书在论述“左”的错误路线支配下,有的学者在当时的政治气氛压力下,违心地写的某些批判西方哲学的作品时,本来不想引用其中的文字,即使引证了,也不想标出作者的姓名,因为这不是他们的过错,对此他们是不能承担责任的。这也是我前面说的怕伤害他们的原因之一。但为了说明问题,还这些阶段西方哲学东渐历史的真实面貌,有的地方还是不得不抱着不安的心情引证了。虽然在书中为此有过具体和详细的解释,但还是使我一直深感内疚。因此,当本书问世时,除了对这些学者表示歉意外,还希望广大读者予以理解。

本书定稿后,我即进入《中国台湾学者对西方哲学的研究》的研究过程。台湾的有关学术团体早已向我发出了前去考察和研究的邀请。我希望这一计划能顺利进行。要是我的这一工作有助于促进两岸学术界的相互了解,特别是如果写成后把它和前书经过提炼,形成一部完整的《西方哲学东渐史》(1949—)问世时

候，两岸的统一实现了，那是我多么梦寐以求的啊！我在日夜盼望着这一天早日到来。

目 录

自序	(I)
绪论	(1)
一 西方哲学东渐的历史回顾	(1)
二 研究西方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7)
第一章 西方哲学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起始传播(1949—1956)	
第一节 西方哲学初始传播阶段的社会背景	(11)
一 思想战线上的建设任务	(11)
二 制约西方哲学传播的特殊条件	(15)
第二节 输入前苏联有关西方哲学的作品	(17)
一 日丹诺夫批判西方哲学的发言	(18)
二 俄国哲学史的全面译介	(24)
三 近代法德哲学通俗读物的引进	(28)
四 输入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的有关论著	(33)
第三节 输入其他国家学者批判现代西方哲学的作品	(39)
一 威尔斯论实用主义是帝国主义哲学	(40)
二 康福斯对逻辑实证论的反复讨伐	(43)
第四节 中国学者继续传播西方哲学的开始	(47)
一 学习日丹诺夫关于西方哲学的讲话	(49)
二 对西方哲学中认识论的批判	(53)
三 对西方哲学中不可知论的抨击	(56)
四 批判实用主义哲学运动	(60)
五 郑昕研究康德哲学的新变化	(64)
六 贺麟传播黑格尔哲学的新起点	(70)

第二章 西方哲学在曲折中传播(1957—1976)

- 第一节 西方哲学传播与政治生活中的“左”倾 (81)
 - 一 政治上“左”倾抬头和发展 (81)
 - 二 西方哲学传播的曲折起落 (83)
- 第二节 继续引进前苏联和其他国家有关西方哲学的作品 (96)
 - 一 哲学史著作的翻译和出版 (97)
 - 二 英法近代哲学论著译介 (101)
 - 三 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成果的引进 (104)
 - 四 批判现代西方哲学著作的输入 (110)
- 第三节 中国学者在曲折中传播西方哲学取得的进展 (116)
 - 一 《哲学史简编》撰写和问世 (117)
 - 二 论述古代希腊哲学的几个重点 (120)
 - 三 纪念培根诞辰 400 周年及其论文 (126)
 - 四 批判康德认识论的基本倾向 (129)
 - 五 对康德三大批判的评介 (136)
 - 六 韦卓民传播西方哲学的成就 (142)
 - 七 贺麟研究黑格尔哲学内容的拓宽和深入 (148)
 - 八 张世英《论黑格尔的〈逻辑学〉》 (152)
 - 九 邢贲思等对费尔巴哈哲学的专题研究 (159)

第三章 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西方哲学东渐之繁荣 (1977—)

- 第一节 新时期工作重点重新确立与西方哲学传播再度繁荣 (167)
 - 一 思想解放和工作重点重新确立 (167)
 - 二 精神文明建设和对外开放 (170)

三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西方哲学东渐 新高潮	(173)
第二节	对西方哲学的多角度综合研究	(178)
一	深刻阐明哲学发展规律的《欧洲哲学史稿》	(182)
二	力求作出科学分析的《现代西方哲学》	(183)
三	运用假说形式探索哲学发展规律	(185)
四	起了重要补充作用的《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 ..	(187)
第三节	古代希腊罗马哲学研究的深入	(189)
一	博大精深的《希腊哲学史》	(191)
二	杨适对人类童年时期思维发展线索探秘	(195)
三	叶秀山挖掘希腊哲学源流	(199)
四	范明生对柏拉图哲学的开拓性研究	(203)
五	汪子嵩为亚里士多德哲学研究进行的基础工作	(209)
第四节	研究中世纪哲学的真正起步	(214)
一	基督教史问世	(216)
二	尹大谊对基督教哲学发展过程的研究	(218)
三	车铭洲建构中世纪哲学体系	(221)
四	傅乐安揭示神秘面纱后对托马斯哲学的深入研究	(223)
第五节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研究的收获	(227)
一	陈修斋的耕耘和收获	(228)
二	余丽嫦研究培根哲学的执著精神	(235)
三	洪汉鼎钻研斯宾诺莎哲学的结晶	(238)
四	邹化政努力钻研洛克著作的新方向	(244)
五	青年学者研究笛卡尔和巴克莱哲学的可喜成绩	(247)
第六节	18世纪法国哲学研究的几个重点	(251)
一	葛力综合剖析法国哲学的新成果	(252)